黄敏兰先生的史学理论研究

■王也扬

《黄敏兰史学文集》,左玉河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8月第一版,168.00元

在黄敏兰先生(1953-2016)逝世五周年之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敏兰史学文集》。捧起这本装帧精美、沉甸甸的书,至今还没有忘记黄先生的人会感到一些慰藉。谢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其史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室,这个黄先生退休前工作的地方支持了该书的出版,左玉河先生还亲自担任主编,做了一件好事。

黄敏兰15岁的时候作为北京知青下乡陕西宜川,十年后恢复高考,她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供职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1年政策允许在外地工作的北京知青回京,其时黄敏兰已经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有了声名,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主任蒋大椿先生接纳了敏兰。

当年77、78级大学生,多是下乡知青中的好学敏思者,他们亲历家国劫难,有强烈社会关怀,积极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探究,黄敏兰就是这样的人,她也是这样加入史学理论研究的。我们看到,在她的文集中,关于历史规律问题的研究,关于民主、专制及传统文化问题的研究等等,都充满反思和探索精神,也都极具现实意义。

史学理论研究,必须对人类社会历史作整体观察,古今中外、政经文化皆互联互通,这就要比那些严守一个国别史和一个时间段的研究者,视野、思路开阔许多。《黄敏兰史学文集》中,关于中西封建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关于中西方赋税理论的比较研究等内容,反映出作者研究思考领域之广泛,而她所以要做这些研究,又始终不离她的社会关怀,即探究中国何以走了一条不同于西欧的历史发展道路。在中西比较研究中,概念问题颇为难人,譬如社会形态的概念。黄敏兰等学者对"封建"概念做了较多关注和研究,认为这个概念出自西欧某种典型的社会结构,拿它来套解中国两千余年的古代社会多有不合,这在学术上是可以讨论的。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如果"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

历史研究贵在求真,但求真不易。这一方面因为历史已经逝去,留下的只是片断资料甚或空白,要完全恢复其原貌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则在于后人的认知,毕竟历史是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东西,各人对所谓"真实"的看法是不同的。黄敏兰对农民战争史研究曾投入较多精力,她觉得以往的理论有时会对史料解释产生误导,"中国古代社会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完全不相同",我们看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应该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也不能仅从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来说明具体的社会现象。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制,与财产占有、经济行为和阶级属性都没有直接的关系,确切地说,中国古代是一种皇帝和上层官僚集团对全体平民的压迫、剥夺体制,被压迫、剥夺者不仅仅有贫苦农民,也包括庶民地主、商人等在内。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刘邦,身为地方上的亭长,《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尝徭咸阳",即被朝廷征服徭役。所以,如果仅以"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理论来解释农民起义,有时就说明不了问题。

很是不幸,黄敏兰中年即患脑疾,几次开颅手术,笔者回史学理论研究室与她共事时,她已经步履蹒跚,激素治疗使脸庞变形,完全不见了在全国第一届史学理论研讨会上的英姿。想到这本文集中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她患病以后的作品,了解敏兰的读者都不免会心痛。笔者见她从家来所里要挤一个钟头地铁,曾叫她打车,研究室给解决车费,她说所里对自己照顾够好了,竟没有报销过一次。2010年,作家史铁生逝世,敏兰痛哭了一场,他们都是下乡陕西的知青,又同被重疾折磨多年,两人在病痛中思考写作,结为好友。敏兰很快写出长篇悼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字里行间渗透了知青一代的情怀与感念,她从铁生的离去大约已经感到了什么。敏兰最后的四年,双目失明,家中只有一个女儿与她相依为命,她谢绝大家登门探望,说家里乱不好意思,可在电话里却依然谈笑风生,依然关怀着家国社会……完全听不出是个重病在身的人。

如今五年过去了,敏兰,你在天堂可好?

敢为天地再立心 ——读《人类的智慧和生活》有感

■包汉毅

《人类的智慧和生活》,刘长允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5月第一版、2021年8月第3次印刷,72.00元

读完刘长允老师的《人类的智慧和生活》一书,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北宋大儒张载先生的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类的智慧和生活》一书并非单纯地复古,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理念、特别是"天人合一"和"允执厥中"的思想为依循,以经验的实证、逻辑的思辨和智慧的洞察为方法,以人文关怀为指归,考虑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新时代条件,为天地再立心、为生民重立命、为往圣扬弃绝学、为新世纪护太平!

在新的世纪,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然而,世界的三大基本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冲突,非但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呈现急剧恶化的态势。作者认为,这场新世纪的危机与以往任何一次相比都有质的不同,是更全面、更根本的危机,是人类自身的错误理念和行为造成的。

在本书第一章"开天辟地一瞬间"里,作者在综述、批判人类有史以来的各类重大宇宙起源学说以后,指出:"就目前来看,人类的认识不足以解释宇宙起源等根本性问题。"作者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正是这样一种宇宙的终极奥妙的存在,一切的哲学、宗教和信仰,一切的探索和遐想,一切的激情和浪漫,才会有其寄托和依傍。

作者的行文架构极具匠心。在第一章阐发本体论的"无极生太极"以后,紧接着的第二章就是"太极生两仪"。在第二章"阴阳二气铸男女"里,作者高度赞美性和爱情,指出:"'性'是宇宙间比'力'更基本的存在和更深刻的冲动……人类只有以性的方式存在,生命才有意义,繁衍才有可能。""爱情是人类所有情感中最激烈、最美好的感受。她也是人类其他美好感情的土壤和源泉。"作者在本章贯彻了辩证的"允执厥中"理念,"叩其两端而竭焉":一方面赞美性,另一方面又正视性的盲目冲动和巨大魔力;一方面认为性与生命相连,另一方面也看到性与死灭相连;一方面认可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又承认男女间的差异……要之,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关系,是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石,因此把握处理好男女关系至关重要。

太极生两仪以后,两仪又生四象和八卦,八卦乃演万物,所以第三章就是"岁月如歌一万年"。在本章中,作者以一种宏大的三维架构(竖则自古迄今,自农业文明以至工业文明;纵则自中华以至外邦;横则自文字发明、科学技术、理想信仰以至组织制度、城乡变奏、衣食住行和节日庆典各个领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人类发展史的包罗万象而又波澜壮阔的画卷。"在未来的岁月……不管到什么情况下,不管碰到什么困惑和厄难,只要还记住我们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那我们人类仍然有救,那我们人类仍会拨乱反正,回归正途。"鉴往以知来,作者指明了人类未来的康庄大道:敬畏顺应自然、充满宗教情愫、探寻终极价值、追求大同理想、稳定婚姻家庭、合适城乡比例、创造生活方式、幸福生活为本、智慧统领知识……

八卦既演万象,然而有一样却不在这万象之间,也或者可以说,存在于每一象之上,这就是人的心灵或曰意识。意识与外物之间的关系乃是哲学的根本命题,其中首要的是意识对于外界的反映,即认识论问题。在第四章里,作者从天人合一或曰心物一统的理念出发,借鉴西方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奥古斯丁、笛卡尔等人的理念,点明了人的认识乃是基于先天先验。紧接着又指出了后天探索的功用:内省和感觉,是人类认识理解世界的两大主要途径;归纳和推理,是人类认识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在这之后,作者对于几千年来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了批判性综述,主要包括数学发展史的三次大危机、物理学发展史的四次大综合、化学发展史的四次大飞跃和生物学发展史的三次大震惊。在论述中,作者也始终贯彻了允执厥中的理念:一方面,认为宇宙是可以被认识和理解的;另一方面,指出人的认识能力和范围是有限的,有其永远不能抵达的地方,大自然在人类面前永远具有神圣感和神秘感,而这对于人类恰是一件莫大的好事。

在人的意识与外界的互动之中,需要有信仰,以克服可见的有限与期望的无限之间的矛盾。因此,在题为《孔子基督如来佛》的第五章里,作者主要介绍了儒家、基督教和佛教的学说、传播以及影响。对于往圣先贤的绝学,在作者看来,不是单纯一个"继"字就能打发掉的,而是应该有扬、有弃、有创。之所以要发扬,是因为它们"都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希望和指南","它们都主张赋予人类信仰和生活的意义,它们都主张要仁者爱人、爱人如己和普度众生"。然而,这些绝学都是发端于公元前八到前二世纪的所谓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如今,人类在历经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已跨入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新时代,两千多年前的一些思想、谋划、规矩"在今天或许很多地方都不再适应",所以要舍弃、要创新。作者也因此呼唤第二个轴心时代的到来。对于这一人类文明的重建,作者首推儒学的重大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儒学不是出世的宗教,而是一种入世的学说,另一方面儒学又能够给予人以终极的精神关怀,提供人生的神圣感。

在第六章《人间大道真善美》中,作者概述和评析了古今中外关于真善美的经典学说和动人故事,进而指出:"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路途自始至终都是不平坦的,都是在与假恶丑的激烈博弈中艰难前行的。"原因在于:"人是处在动物和神之间的生灵,兼有动物性和神性,往下走就接近于禽兽,往上走就接近于神明。"在当前的后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固然高度发达,但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消费主义盛行、假丑恶大行其道。其实,物质本无好坏,关键在于人心;心驰于外,不能自守,自然就愈来愈远离幸福家园,陷入病态。作者为此忧心忡忡,指出:"坚守和弘扬真善美,就要坚信爱的无穷力量,就要相信只有爱才能超越和征服一切。"

当今的社会,物欲横流,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作者因而在第七章发出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慨叹。然而,天人本来合一,心物原就一统,所以,作者"对人类走出困境迎接新文明时代的到来,充满信心和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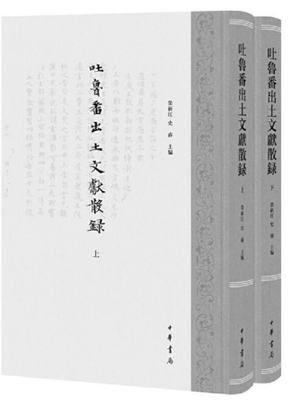
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为"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作者看来,要达成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的转折,要靠人心的能动性,"靠人类的智慧和力量"。作者认为,就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言,"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能为我们当今人类的生活提供诸多借鉴和启示"。作者最后着重指明:永远感恩、敬畏大自然,重视对理想和精神生活的追求,提高驾驭引领科学技术发展的能力,建设一个和而不同、绚丽多彩的美好世界,让诗意和简朴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流形式……

通篇来看,本书自道生一而始,纵论一生二、二生三乃至三生万物;从本体论着手,经由认识论以至实践论;以为天地再立心为基石,以为生民重立命为蓝图,以为往圣扬弃绝学为梓材,以为新世护航太平为愿景……如此这般,构筑起了一座宏伟而又精巧的大厦。在每一章,无论是大命题、还是小命题,无论是行文铺陈、还是最后结语,作者都绝不模棱两可、含糊其辞,而是条分缕析、要点分明。而且,各个要点皆辅以精到而又翔实的论证与阐述,实可谓骨架鲜明而又血肉丰满。

"知君关心两件事,世上苍生架上书。"作者花费十余年之时间,综合古今近百家之言,间出己意,始得成就此书。这真是: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皆精华。笔者缀述如上,实为佛头着粪,如读者因着本文的提示而得一读此书、亲聆原音,并从而优入圣贤学问之域,则幸何如之!

吐鲁番文书整理的重要拼图

■武海龙



《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全2册),荣新江、史睿主编,中华书局2021年4月第一版,416.00元

吐鲁番文书内容极其丰富且庞杂,所涉及领域更是复杂多样,许多内容为传世文献未记载,但又是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资料。吐鲁番文书与敦煌文书相比,更为难治。与敦煌文书出自藏经洞不同,吐鲁番文书出土于吐鲁番盆地各处的古城址、古墓葬及石窟寺中,加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在吐鲁番盆地大肆盗掘,致使这些"原生态"资料散落世界各地。陈寅恪先生曾言"敦煌者,吾国之学术伤心史也",从当今学术史角度来看,吐鲁番在近代所遭受的"文化浩劫"同样令人唏嘘。随着国外一些大的收藏机构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刊布,使我们不必远涉重洋,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看到几乎所有的吐鲁番文书,但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小的收藏机构或个人的收藏仍"养在深闺人未知",仅有少数学者能窥其面貌。吐鲁番文书按语种可笼统地分为汉文文献与胡语文献;按文书性质又可划分为非宗教类文献与宗教类文献。虽然国内机构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旅顺博物馆等收藏的汉文文书都已集中刊布,但以往的整理刊布缺乏针对性,各类文献杂糅其中,对不同收藏机构中的同类型文书之间的关联性重视不够,不利于学界使用。吐鲁番文书中的汉文非佛教文献是中古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学界历来极为看重,但对散藏世界各地(特别是小的收藏机构及私人手中)的汉文非佛教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刊布、录文的工作则一直进展缓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大学荣新江、史睿二位教授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出版,完成了吐鲁番文书整理的一块重要拼图。

《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下文简称《散录》)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按照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法编排,并在经部下单列小学类,在经史子集后又加入道教文献、摩尼教文献、佛教写经题记三类,虽然这三类文献亦可归入到宗教类文献中,但题记中的纪年、人名、地名等重要信息是解锁历史研究中重大问题的钥匙,加入这三类文献,可见作者经过了深思熟虑。

下编为公私文书,按照年代排序。吐鲁番文书中的公私文书主要出自古墓葬,对此类文书进行集中整理刊布较有代表性的是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1-10;图录本1-4)、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上、下)、池田温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1-4)等,在中古史研究中这些公私文书最为史学研究者所倚重,许多材料可补正史之阙。此次《散录》下编刊布的公私文书,虽有学者进行了个案研究,但对这些文书进行系统整理、刊布还是第一次。

仅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史学研究的角度,我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文献搜集全面、彻底。吐鲁番文书的"难治",原因无外乎两点:一是文书收藏地分散,由于上个世纪初各国探险家在吐鲁番进行大肆盗掘,导致这些文书散落世界各地;二是同一件文书由不同机构收藏,上个世纪初探险家在吐鲁番各遗址探宝式的盗掘,当地农民为追逐利益也加入其中,就导致了许多同卷文书四分五裂,现散藏世界各地。《散录》主编之一荣新江教授是现今国内最具国际视野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师从许理和教授学习,因此得以有机会遍访伦敦、巴黎、柏林、不莱梅、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各大收藏机构,获知了当时许多不为国内学者所知的敦煌吐鲁番文献。(荣新江:《欧洲所藏西域出土文献闻见录》,《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第119-133页)此后三十多年间又多次往返欧美、日本等西域出土文献收藏机构考察访学,记录摘抄的卡片不断丰富,出版有《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等吐鲁番文书目录性质著作(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之后又相继主持参与吐鲁番博物馆藏新获文书及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的整理、出版工作(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主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正是这些过往的学习工作经历,促成《散录》得以书成。

二是注重不同收藏机构文书间的缀合。文书缀合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由于各国探险队对吐鲁番文书的掠夺,致使许多同卷文书散落世界各处收藏机构,甚至同一收藏机构里的不同文书残片,受限于资料公开程度,缀合工作进展较为缓慢。《散录》编写组成员借助外出调查及访学机会,遍览各收藏机构的吐鲁番文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缀合工作。例如,《文选》李善注卷三五《张景阳七命》缀合复原图(李昀《吐鲁番本〈文选〉李善注〈七命〉的再发现》,《西域文史》第九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35-152页;图版参见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上),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4月,图版第35页),便涉及德藏、俄藏、日本龙谷大学及旅顺博物馆所藏11件残片。又如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的《礼记·坊记》残片经《散录》编写组成员游自勇教授考证,可与俄藏、德藏残片缀合(图版参见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上),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4月,图版第1页)。如果不是编写成员对各地所藏文书的熟稔,缀合复原工作将很难推进。此次《散录》在编撰过程中,对于取得版权的照片,能缀合者皆给出了缀合后的高清图版,为研究者的使用提供了便利。

三是制定了科学的凡例。国内学界对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始于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该书所制定的凡例为学界沿用。此次《散录》编撰凡例过程中,区别于以往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所收文书按照中国传统古籍分类编排,并收入道教、摩尼教、佛经题记各类,每类中按照大体成文年代为序。与以往收藏机构刊布文书为单一机构所藏不同,此次《散录》刊布文书涉及到19处收藏机构,许多文书可缀合,如果按照以往分类方法势必会割裂文书间的内在联系,因此这种分类排序是科学合理的。二是编者充分吸收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每件文书给予拟题,以往文书在拟题上存在着许多偏差,如《散录》上编子部收录俄藏皇甫谧所撰《针灸甲乙经》原定名为《黄帝内经·素问》,此次《散录》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予以订正(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上),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4月,第153页)。此外每件文书在断代、定性及特征方面做出解题说明,内容详实,包括文书尺寸、行数、正背关系、缀合情况、原定名及今定名,并在解题后附国内外学者关于该文书的研究成果,便于查阅。

《散录》一书稍显遗憾之处是图版较少,个别图版缺少高清图版,当然这与文书收藏地过多,版权问题复杂有关。《散录》在排版时如将图版与相关录文放置一处,将会更加直观方便。

总之,《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的出版补足了吐鲁番文书整理的一块重要拼图,是一部比较实用的工具书,有着较高学术价值,是我们阅读、研究、整理吐鲁番文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今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也有指导与借鉴意义。